

我的高考之路

应忠良

1977年秋,我们刚刚跨出校门不久,神州大地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单纯、浑如一张白纸的我,不知道有大专中专之别以及本科专科之分,更谈不上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与方向。其时的我,更像是大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只是随着潮流沉浮起降、朝前涌动而已。

据相关资料,由于高考废弃达11年之久,当年全国参加高考的人数达到570万之众。而学校以及招生规模有限,只好采取初试加复试的办法。当年11月25日,初试在本镇中学举行。12月15日,我和部分初试合格的同学赶往县城大司巷小学(当时称东方红小学)参加文科复试。仓促应战,加之录取比例奇低,1977年的高考,我们全班50多名同学全军覆没。年少不知愁滋味,加之我既非独类,自然也无多少沮丧。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时,笼罩了十年乌云的神州大地,复苏回暖,百废待兴。四化建设急需大量人才,理工科尤为紧俏吃香,录取考生的人数、比例也大大超过文科。据说1977年高考,全永康文科考生只中了10多名。如果继续报考文科,考取的希望定然渺茫。开始接触社会,初尝人生况味的我,在1978年春天,权衡利弊,违背初衷,决定改考

理工科专业院校。为此,专门向同村高几届的学长借来物理、化学课本,硬着头皮从头自学。就在此时,芝英中学的一位张姓女教师怀孕分娩。蒙学校器重,让年方17岁的我顶职代理初中段的政治课程。

我生性腼腆,第一次走上讲台,脸红心跳,眼光不敢与台下数十名年纪小我不多的男女学生对视。记得当时有一名女生皮肤白皙、模样俊俏,讲课时自己总会情不自禁朝着她的方向多瞟几眼。有一回,我有意让她站起来回答问题,貌似峻厉,内里却怀了鬼胎一样忐忑、心虚。如今都已经忘了她的芳名,只记得名字的后面好像是一个青字。人非草木,日久天长,师生互有好感甚或相互倾慕,往往便会生发出一种别样的情愫来。

那段日子,我白天上课,晚上复习,挑灯夜战。我的数学成绩一向不差,怎奈物理、化学抽象枯燥,硬着头皮钻研,苦不堪言。班主任知道我的烦恼,分析我的优长,促使我改变决定,再度弃理从文。只可惜其时高考已经迫近,时光匆匆,在历史、地理两门功课上不及着力,以至失分不少。

1978年,既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步入正轨的新起点,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年,高考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10万人。我以总分

327分(政治77分、语文65.5分、数学61.5分、历史55.5分、地理67.5分)的成绩,被杭州大学政治系录取。我成了我们村历史上通过高考考取的首名大学生。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虽然学政治非我所愿,但在旁人看来,这小小的缺憾在巨大的荣耀与光环面前实在有些微不足道。

放榜那天,鲜红的捷报张贴于镇中心的墙体上,上面赫然出现了我的大名。榜前人流涌动,熙熙攘攘,语气和眼神写满称颂与钦羨。40多年过去,我早已忘却那年的炎炎夏日,却依旧忘不了师长、亲友们投给我的热切目光和温热的祝福!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母亲为我专门置备了一应生活必需品和一套全新的被褥。姨妈专门送来一条毛毯。姐夫则惠赠我一只钻石牌半钢手表和一件半新不旧卡其布料的中山装。

1978年10月16日,长天晴好,曦光微露。吃罢家里为我精心烧煮的鸡蛋面条,我挥手告别养育我的故乡热土,告别年逾古稀的老父和花甲老母,也告别自己17年的过往人生,跳脱农门,踏上了前往省城求学的旅程。金风玉露,天凉好个秋。汽笛长鸣,铁轨铮铮。列车载着我一路向北,内心几多兴奋,几多好奇,几多忐忑。自然,对于未知的将来也心存几多的期待!

又是一年高考时

黄长征

高考有如一个闹钟,每年的时间指针一到,就会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自己的那段高考时光。对于70后考生而言,七月是一段百结愁肠,是一个必须跨越的节,更是一个考验心智、关乎自身前途命运的劫。那个七月,我们称之为黑色七月。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带着父母为我们省下的白米,吃着学校食堂大蒸笼蒸出的盒饭,就着母亲为我们准备的一罐罐霉干菜和酱豆腐,在高中寒窗苦读三年,一心想要飞出农门,以改变祖父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穷苦命运。

虽有满腔的雄心壮志,但高考的残酷,却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农门依然牢固地矗立在我们面前,欲破不得,坚不可摧。记得那年,我应届高考的龙山中学,一届三个班百来名同学,考进大学的也只有三人。

不气馁、矢志摒弃泥饭碗的同学们,于是选择进城报名高复班,加入复读备考队伍。

当年,县城开设高复班的地方有图书馆、总工会职校、文化宫等,每个高复班生源都异常火爆,简直一位难求,名气好一点的高复班,甚至要托关系才能进入。应届高考落榜的我,为了心中的理想,也随着复读大军,走进了高复班。

高复班里,农村同学居多,原因许是有居民户口的城里同学,不用走大学之路也能分配到工作。居民户口,意味着铁饭碗,在我们当时眼里都视若珍宝。那时因身份不同造成的生活品质差异,迫使许许多多的农村同学,通过考大学的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要实现这个愿望,谈何容易,我们要克服诸如家境条件、教育资源、自身压力等困难。

犹记得那时复读的日常场景,晚自习要到管理员催促锁门才走,回到租住处还要挑灯学习到深夜12时左右才睡觉休息,半月甚至一个月才骑趟自行车回家带米带菜,吃的菜基本也是自带的各种干菜,偶尔也去食堂买份荤菜改善伙食。

初进高复班,以为同学都如我一般第一次落榜复读,渐渐熟识后得知复读复考两三年的大有人在。一位家境贫寒、随母改嫁到一个山村杳见的大哥告诉我,他已考第八年了,因年龄限制,只能最后一搏了。他自嘲是一位经历八年抗战的老战士,久经考场的老童生。

这位大哥非同寻常的经历,让我惊讶,他那百折不挠的精神,更让我敬佩。好在他的这份坚毅最终感动了上苍,八年的艰辛终得回报,考上当时的杭大。毕业后,他分配到省城检察机关工作,后又娶了个家在杭州的大学同学做老婆。正可谓:寒窗苦读,青山咬定,穷山沟里飞出金凤凰,出类拔萃,学业有成,象牙塔上抱得美人归。

遗憾的是,我没有老大哥那份屡败屡战、锲而不舍的精神,历经两次复考的失败,选择了放弃。我想,能改变命运的,一定不只有高考这一独木桥,只要勤奋肯干,在其他领域照样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告别校园,我进入一家大型企业上班。在企业里,我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提干入党,娶妻生子,还被选拔委派到浙师大进修学习,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让自己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锻炼、提升。对这段宝贵的人生经历,我心怀感恩并铭记终生。

弹指间,近三十年过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已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山清水秀的大美乡村,已是城里人趋之若鹜的度假胜地,铁饭碗早已打破不存,农村户口变为比城镇居民户口更吃香,正应验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俗语,大学渐普及,不再是遥不可及,就业门路已是四通八达、五花八门,打工、办厂、代驾、炒股、外卖、快递、直播带货、微商,各路大神,只要脑子活络,一只手机就能各显神通、丰衣足食。

生逢盛世,有道是:狂歌笑,青锋傲,御剑乘风踏凌霄。天也高,云也高,鲲鹏展翅任翱翔!



高考进行时 卢斌 摄

高考往事

楚草

1977年,我的一个表哥在本镇中学读高中,几百人参加高考,全校就他一人考上湖南林学院,不亚于范进中举。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下子传到了十里八乡。

姑丈摆了几桌宴席,感谢老师们的辛勤教育和亲戚们的热心帮助,许多任课老师和亲戚前来祝贺。酒席上,老师称赞表哥学习认真,不耻下问,肯动脑筋。亲戚们则竖起大拇指表扬他勤奋努力,脑子灵活,将来肯定大有出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赞不绝口。作为大舅的父亲,特意请木匠做了一担漂亮结实的木箱,刷上红漆,送给聪明可爱的外甥,祝愿他好好学习,满载而归,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大学毕业后,表哥被分配在贵州省林业厅从事科研工作。他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大学生。

眨眼间,4年之后的1981年7月轮到我参加高考了。那时的高考,由于种种原因,都要进行两次考试(1988年之前都是这样):在正式高考

之前,先要进行一次比较严格的预考。就像时下举办的各类大赛,有初赛、决赛之分,目的就是先过一遍筛子,去粗存精,淘汰一批成绩差的学生。只有那些经过预考达到一定分数的考生,才有资格晋级,参加正式高考。

那时,国家经济相对落后,公办大学不多,民办大学还没创办,即使有钱的家庭也没有办法把分数较低子女送入大学深造。

那时,我在一所普通高中读书,文、理科两个班,共100来名学生参加高考,结果没有一个同学上大、中专线。那时候,在学校即使是学霸也不一定考得上大学,因为许多乡镇中学数百名学生参加高考,都剃了光头。

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有的同学通过复读考上了大学。上大学是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捷径。有的家长,为了让子女考上大学吃上国家粮,即使砸锅卖铁、累死累活、赴汤蹈火,也要培养子女一届又一届地复

读,有的同学抗战八年才考上大学。我班有个同学,为了把基础打牢靠一些,她又返回学校从初一读起,最后考上大学。

还有一些家庭困难的同学则通过参加电大、职大、夜大、函大、业大(简称五大)学习拿到了大专或本科文凭,有的在家劳动,有的外出打工。

我因家庭负担重,兄弟姐妹多,高中毕业后,没有复读。后来,考上中学老师,一边教书,一边自考,几年拼搏,终于拿到大学文凭。

几十年来,我一直非常羡慕现在的青年学子,处在一个好时代,高考录取率年年攀升,从1977年的5%逐步飙升到2016年的82.15%,高等教育事业迅猛发展。据权威数据统计,目前,我国大学数量已超过2500所,大学已从小众化转变为大众化,大部分学子能够跨入大学深造。即使成绩不理想的学生,也能走进职业学院,圆一个大学梦。